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及其影響

--以報導立法院新聞為例

### Exploration of Reporter-Source Interaction: An Examination of News Gathering and Releasing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計畫編號：NSC 87-2412-H004-013

執行期限：民 86 年 8 月 1 日至民 87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王旭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

#### 一、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分析新聞媒體於處理有關立法院的新聞的過程中，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情形，影響兩者之間互動的因素，以及兩者互動對新聞內容可能有的影響。記者採訪新聞的過程相當繁複，為求確實了解其中動態，本研究採方志學（ethnography）的取向，以記者採訪立法院新聞為觀察對象，由親身觀察獲取第一手資料。

研究發現，立法委員和新聞記者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對彼此的利益在供給和需求上形成的滿足或衝突，這些關係還會因為雙方在創造新聞價值上的能量多寡、以及新聞素材的稀有程度而產生變化。

#### Abstract

This study would like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egislators and reporters, its impact on media content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data gathered by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islators and reporters is the balance or conflict between the demands and supplies of each. Besides, the capability in setting news agenda of legislators and reporters and the scarceness of news releasing would affe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 二、緣由與目的

如果以 Lasswell (1948) 提出的「誰，說了什麼，經由什麼通道，給誰看、聽，產生什麼效果」傳播模式來區分傳播研究的性質，近年來有關第一個「誰」的部份獲得愈來愈多傳播研究者的重視。在鑽研傳播「產生什麼效果」數十年後，研究人員發現，如果能對傳播者有進一步的了解，對傳播效果的研究就能有更全面的觀照（李金銓，民 70）。

就新聞這個領域來講，傳播者的研究一開始從探討守門人的工作常規著手（White, 1950）。守門人指的是在新聞媒體裡工作的個人，他們經過新聞室的社會化，扮演專業角色來從事蒐集新聞素材、產製新聞報導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正由於守門人在蒐集新聞素材上，相當倚賴消息來源提供資料（Park, 1940），在進行傳播者研究、探討前述第一個「誰」的時候，消息來源成為另一個受到關注的焦點。對消息來源和對新聞室守門人的研究，形成新聞領域裡有關傳播者研究的兩大主軸。追根溯源，這兩項主軸各有其典範思維，指引相關研究的執行。

在消息來源的探索上，有研究者視新聞媒體為公共論壇，社會大眾的意見在此交流，透過理性批判的辯證

過程，社會大眾得以達成共識（Habermas, 1989）。在這種哲學思維下，研究消息來源的目的在檢視社會中誰在享用新聞媒體，誰比較有機會透過媒體表達理念，民眾是否能自由平等地接觸新聞媒體，以及不同形式的消息來源（如匿名）或新聞來源的偏頗，會不會使得社會大眾在理解新聞內容時出現困擾（鄭瑞城，民80）。

另一方面，結構功能論者視新聞媒體為一個社會次系統，此一次系統的運作會和其他的社會次系統相互影響（DeFleur, 1966）。在此典範思維下，新聞媒體所呈現的內容是這些交互作用下的產物，而有關新聞媒體以及從業人員方面的研究，應由其在整個社會體系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發揮的功能出發，可由不同層面進行檢視。

在社會整體層面上，不同的政治體系會制訂出不同的媒介制度，進而影響新聞媒體對新聞的界定，也就決定了媒體的作業準則和呈現的新聞內容（McQuail, 1994）。就組織層面來講，在自由民主的多元社會情境下，新聞媒體基於本身的營運需求，必須有效調配人力、物力等資源，決定採訪路線，也就限定了新聞記者所扮演的職業角色（Tuchman, 1978）。就新聞記者來講，在蒐集新聞素材上，或是因為其對民眾日常生活影響很大，或是因為其本身就是公共資訊的匯聚場所，傾向以政府部門、工商機構和社會團體為採訪對象（Tuchman, 1978; Sigal, 1986）；再細部來看，記者較常訪問各機構裡的領導階層或採訪各機構裡的例行作業（Gans, 1979; Roshco, 1975）；記者也發展出一套衡量新聞素材價值的標準，例如顯著性、影響性、突發性等，作為取捨新聞素材的依據（Galtung and Ruge, 1965），種種為利於達成工作要求而考量的因素左右了記者的職業行為，

連帶地限制住新聞內容報導的範圍（Fishman, 1982）。

從新聞媒體為一公共論壇的角度出發，研究消息來源的重點是探究社會上各種不同的意見能否反映在新聞報導上，研究問題是哪些消息來源的意見能為新聞媒體採納。從結構功能的角度來看，研究守門人的重點之一在於記者採訪新聞時所依循的準據，研究問題是新聞記者採納哪些消息來源的意見。儘管出發點有異，兩個研究取向都強調，如果要對消息來源或守門人個別有深入的了解，不但要對兩者分別進行探索，還要檢視兩者之間的互動。究其實，新聞內容是由消息來源和新聞記者共同建構的現實，也是兩者相互協商的結果，雙方對新聞內容都有影響力（Schlesinger, Tumber and Mrudock, 1991; Ericson, Patricia and Chan, 1989）。

由互動的觀點來看，消息來源不是靜待新聞記者前來採訪，而是以本身具有的條件吸引或爭取記者的採訪，建立與媒體的良好關係，以博得在公共論壇上的發言權。新聞記者在衡量各新聞素材的價值時，各個用來評鑑的依據不是固定不變的，記者會隨時調整對各新聞素材的評價，在不同情境下選取適合的消息來源及報導題材。新聞採訪是複雜而動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記者與消息來源互相競爭與合作以達成各自的目標。

以記者和其採訪單位的互動為例，後者往往傾向以記者會的方式發佈新聞。記者會既是一種公開資訊的方式，也是一種控制資訊的手段（Gandy, 1982）。記者會提供記者取得資訊的管道，同時也剝奪了記者親自觀察組織內部作業、或接觸組織內其他人員的機會。儘管記者可以利用不列入記錄的談話、或是有人洩密的途徑，取得正式管道之外的消息（Sigal, 1973; Tiffen, 1989），但消息來源可以拒絕不友善媒體記者的採訪，或給

子友好記者獨家消息，進一步令記者屈服。記者或是與消息來源合作，或是與消息來源對抗，在此過程中難免要讓出部份自主權，而消息來源也面臨類似的兩難。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過程中的種種權宜措施，型塑了新聞報導的內容。

基於以上論述，本研究中「消息來源」的概念定義（conceptual definition）是彼此競爭使用新聞媒體的團體或個人。「新聞記者」的定義是，向消息來源競逐新聞素材的新聞媒體從業人員。不論是消息來源或新聞記者，都處於內部和外部的競爭情境。至於兩者之間的互動，指的是雙方在提供和蒐集新聞素材時彼此之間的影响，以及被用來影響對方的方法。而新聞的內容則是消息來源和記者互動之後，新聞媒體所呈現的相關報導的內容。

國外有關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的研究開始得相當早，Gieber and Johnson (1961) 就從此一觀點出發，認為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可依兩者相互滲透的程度做不同區分。近年來 Bruce (1992)，Hess (1984)，Murphy (1978) 等，分別展示行政機關、議會、法院、警察和企業組織如何運用正式管道（如記者會或簡報）和非正式管道（如背景說明或洩密），或明或暗地影響記者，以期達到「隱惡揚善」的目的。雖然新聞採訪是動態的複雜過程，但是在各種機構中，由於對宣傳的需求程度不同，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也就有所差異。例如 Ericson et al. (1989)，Cook (1989) 等指出，因為議員本身的連任需要、議會行政作業較為公開、以及對內部的資訊管制較為寬鬆，議會中消息來源與記者間的生態關係，就不同於一般行政機關。

國內有關消息來源的研究，大部份是由新聞內容著手，分析新聞中所引用的消息來源的特性；有關新聞記

者的研究，多半在檢視新聞記者的背景及專業認知。

從新聞媒體應為公共論壇的角度出發，有研究者分析新聞內容所引用的消息來源是誰，以此評鑑媒介近用權落實的情形。鄭瑞城和羅文輝（民 77）分析國內電視新聞的消息來源，發現消息來源多半是男性、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學者專家、機構主管、來自台北市，為台灣社會的上階層人士。另外，在以單一新聞事件內容為分析對象的研究裡，研究者發現新聞媒體在處理弱勢團體的新聞時，所選擇的消息來源除了弱勢團體和一般社會大眾外，還有專家學者、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的人員。儘管與事件有關的人士都能透過媒體表達意見，不過弱勢團體講話的機會較少；但長期來看，隨著社會結構的開放和社運團體的成長，弱勢團體享用媒體的機會有增加的趨勢（鄭瑞城、陳雪雲，民 80）。

在新聞記者方面，鄭瑞城（民 77）發現，台灣地區的記者多為男性、外省籍、擁有學士學位、四十歲以下。陳世敏、彭芸和羅文輝（民 77）的研究發現與鄭瑞城類似。除了人口背景外，羅文輝（民 84）指出，大多數的新聞從業人員認為自己有相當高的工作自主權，自主權愈高、工作滿意度也愈高、對工作機構新聞報導的評價也愈高，他還進一步探索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價值觀。

有關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孫秀蕙（民 83）在探討環保團體的公關策略時發現，環保團體在扮演消息來源的角色上，以密集發佈新聞稿、文宣品的方式提供記者報導素材，建立其在大眾傳播媒體上的發言場所，更藉著團體成員本身在文化資本上的優勢，以意見領袖的身分影響輿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探討：

1. 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之間的互動情形，
2. 各互動情形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以及

3.各種互動對新聞的內容有何影響。

消息來源除了和記者間有所互動外，也會和記者所屬的媒體組織交往；此外，新聞素材在由記者處理後到成為媒體的產品之間，會經過繁複的組織過程。本研究嘗試在消息來源和新聞記者間的互動上進行初步探索，為便於執行，媒介組織不在本研究的檢視範圍之內。在研究對象上，則鎖定有關立法院的新聞採訪和報導。在方法上，新聞內容既是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共同建構的現實，新聞記者和消息來源的交往是公開和私下並行的過程，在手段上是合作與競爭並用，兩者間的互動錯縱複雜。因此，本研究擬採方志學（ethnography）的取向，觀察記者和消息來源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互動，以確實理解兩者之間的遊戲規則，評估這些遊戲規則是否能發揮公共論壇的功能，並檢視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對新聞內容的影響。

### 三、結果與討論

研究人員參與觀察立法院新聞發佈與採訪的情形，認為最主要的消息來源是立法委員，而其與新聞記者之間的互動，則可由「利益」的供給與需求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進行分析。

立法委員的利益，可分為（1）塑造在選民心目中的問政形象，俾便日後連任，（2）營造自身在其他政治人物眼中的份量，俾便取得或維持較大的權力，（3）其他有關立委自身的利益，如為所經營的事業牟取較大的利潤等。對一名立法委員來講，這三種利益的滿足需要倚賴新聞媒介的程度高低，是影響其與新聞記者採取何種互動模式的關鍵。至於新聞記者的利益，可分為（1）日常工作所需要的新聞素材，（2）對新聞工作的

自我期許，（3）其他附屬於新聞工作，但與新聞無直接關係的利益。對一名記者而言，這三種利益之於自身的重要程度，是影響其與立法委員互動的主要因素。

從整體來看立委和記者的利益，發現雙方個別的利益，有為對方的利益所滿足的可能。立委要塑造在選民心目中的問政形象，選民對立委的印象主要從接觸媒體的相關報導而來，且媒體記者也正需要與立委有關的素材來產製新聞。另一方面，這種雙方利益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係，除了互補、平衡之外，也有形成衝突的可能。當一方有能力供給，卻不願意提供這項供給，以致另一方的需求無法獲得滿足，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之間的衝突於焉產生。再就個體而言，所有的立法委員在競逐上述利益的過程中，彼此之間必定會產生衝突，同樣地，記者與記者之間也會有利益上的衝突。

用以化解衝突或滿足利益的資源，除了上述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的利益外，立委和記者在創造新聞價值上的能量大小，允為關鍵。所謂創造新聞價值，指的是同樣一個新聞素材，如果當事人是甲立委的話較具新聞份量，當事人如果是乙立委則較不具新聞價值，或者如果由甲媒體報導能獲得較大重視，而由乙媒體呈現的話則不會受到多少重視。也正因此，立法委員有意識地營造本身在創造新聞價值上的能量，例如組成次集團體、或發掘問政議題等。而新聞媒體也會由於各自發行量（就報紙而言）的大小、或收視率（就電視而言）的多寡，而在立委眼中有不同的受重視程度。一般來講，具有黨團或次級團體職務的立委，較具新聞價值，能滿足記者較多的需求，而電視被認為有較大的影響力，電視記者叫報紙記者較能滿足立委需求，能由立委處得到較大的資源。

由立委與記者之間利益的需求與供給，以及利益的滿足和衝突，或許可以用一條曲線描繪立委與記者之間的互動。曲線的一端是雙方彼此滿足、結成一體，另一端則是彼此衝突、相互攻防。不過，對任何立委和記者來講，這種曲線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受到新聞素材的稀有性所影響。有關立法院的新聞報導，依新聞事件發生的場景，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會議新聞，舉凡開院會、委員會、記者會等皆屬此類，其特色為新聞事件公開呈現，所有記者都有同等的機會對此事件進行完整觀察。二是協調新聞，主要出現在各立委對政策或法案有所爭議的討論過程中，其特色為記者可以很明確地找出事件關鍵人進行採訪，儘管不是每名記者都能從各個關鍵立委得到同樣豐富的新聞資料，但最起碼能指認出關鍵立委，且能從政策或法案的公文書裡取得相關資料，這些資料對所有記者有同等透明的開放程度。三是背景新聞，立法院有別於行政部門的特色之一，在於政壇耳語特別多，經驗累積的結果，部份耳語具有風向球的性質，具有相當的新聞價值。對於記者而言，如果立委不講，就無法取得這些背景新聞。

會議新聞、協調新聞和背景新聞，在對記者的開放程度上由高至低。就立委與記者之間的互動而言，在開放程度較高的新聞情境下，雙方彼此滿足的可能性較大，在開放程度較低的情境下，立委僅能滿足少部份記者的需求，與其他記者之間自然會產生衝突。

話說回來，不同的互動情形，對各個媒體的新聞表現而言，沒有太大影響。其間的主要機制是，各個媒體會分派不同的記者扮演不同的角色、肆應彼此利益相衝突的各個立委的需求，由媒介組織內部設計的準衝突，來消除組織外在環境衝突可能造成的困擾。

####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選擇立法院新聞報導作為研究個案，探討立院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及其影響，是基於三層考量。首先，就新聞應為公共論壇而言，立法院是全國最高立法機關，所訂定的法令將規範全國人民。在立法的過程裡，理論上，各種不同的意見都應有充分的表達機會，在國會論壇上辯論，各立委相互說服取得共識。新聞媒體報導立院新聞，也應完整反映立法過程裡的各種意見並告知大眾。在探討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時，以報導立院新聞為主題，是檢驗新聞媒體是否扮演好公共論壇角色的最佳觀察點之一。

此外，施行民主政治的前提之一是民眾關心和參與公眾事務，而新聞媒體一向被視為培養民眾民主素養的重要管道。也就是說，報導立院新聞除了要反映立法院裡的各種意見外，還要讓一般民眾能夠對立法議題有所了解，進而增加其政治參與程度。新聞報導的品質在此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本研究探討採訪立法院新聞的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對立院新聞內容的影響，研究結果應能對此有些參考價值。

最後，近年來國會亂象頻傳，立法院被視為全國政治亂源所在，而報導立院新聞的記者，也不時被指責在其中推波助瀾，是亂源中的亂源。如果能有系統地檢視記者和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找出在何種情境下、對於不同性質的主題，具有何種特質的消息來源會對各個新聞記者採取哪些交往方式，或是具有何種特質的記者會對各個消息來源採取哪些交往方式，以及這些交往方式對新聞報導的影響，對於改進國會新聞的呈現方式應能提供相當助益，間接對提昇國會問政水準和民眾政治參與有所貢獻。

本研究探索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互動，以及此一互動對新聞內容的影響，研究結果將充實有關傳播者的研究內涵，並及於傳播內容的了解，有助於勾勒出傳播過程的全貌。國內已有學者針對新聞記者或消息來源進行研究，本研究從雙方互動的角度切入，期能對此主題有些許補充。

## 五、參考文獻

- 李金銓 (民 70)  
大眾傳播學，台北，三民。
- 林福岳 (民 85)  
「閱聽人地理學---以『民族誌法』進行閱聽人研究之緣起與發展」，新聞學研究，第 52 期，頁 167-86。
- 陳世敏、彭芸、羅文輝 (民 77)  
制定新聞記者法可行性之研究，行政院新聞局專題研究報告。
- 孫秀蕙 (民 83)  
「環保團體的公共關係策略之探討」，廣告學研究，第 3 期，頁 159-85。
- 鄭瑞城 (民 80)  
「從消息來源途徑詮釋媒介近用權」，新聞學研究，第 45 期，頁 39-56。
- 鄭瑞城 (民 77)  
透視傳播媒介，台北，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
- 鄭瑞城、陳雪雲 (民 80)  
政治性街頭運動新聞之消息來源分析---以解嚴前後之聯合報為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
- 鄭瑞城、羅文輝 (民 77)  
電視新聞消息來源人物之背景與呈現方式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
- 羅文輝 (民 84)  
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價值觀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

## References

- Bruce, Bredan (1992)  
Images of Power. London: Kogan Page Limited.
- Cook, Timothy E. (1989)  
Making Laws and Making New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DeFleur, M.L. (1966)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 Fishman, Mark (1982)  
“News and Nonevents: 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In J. Ettema and D.C. Whitney (eds.) Individual in Mass Media

- Organizations: Creativity and Constraint, pp.219-40.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Galtung, J. and M.H. Ruge (1965)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64-90.
- Gandy, Jr. Oscar H. (1982)  
Beyond Agenda 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ew Jersey: Ablex.
- Gans, Herbert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 News, Newsweek, and Tim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Gieber, W and W. Johnson (1961)  
“The City Hall Beat: A Study of Reporter and Source Roles”, Journalism Quarterly, 38:289-97.
- Habermas, Ju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Great Britain: Polity Press.
- Hess, Stephen (1984)  
The Government/Press Connec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Lasswell, Harold (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Reprinted in W. Schramm and D. Roberts (eds.)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cQuail, Denis (1994)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Sage.
- Murphy, Dave (1978)  
“Control Without Censorship”. In J. Curran (ed.) The British Press: A Manifesto, pp.171-91.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Park, Robert E. (1940)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XLV(5), pp.669-86.
- Roshco, Bernard (1975)  
Newsmak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lesinger, Philip, Howard Tumber and Graham Murdock (1991)  
“The Media Politics of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2(3):397-420.
- Sigal, Leon V. (1986)  
“Sources Make the News”. In R.K. Manoff and M. Schudson (eds.) Reading the News, pp.9-3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Sigal, Leon V. (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Massachusetts: D.C. Heath and Company.
- Tiffen, Rodney (1989)  
News and Power. Sydney: Allan and Unwin.
- Tuchman, Gaye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White, David Manning (1950)

"The Gatekeeper". Journalism Quarterly,  
27:383-90.